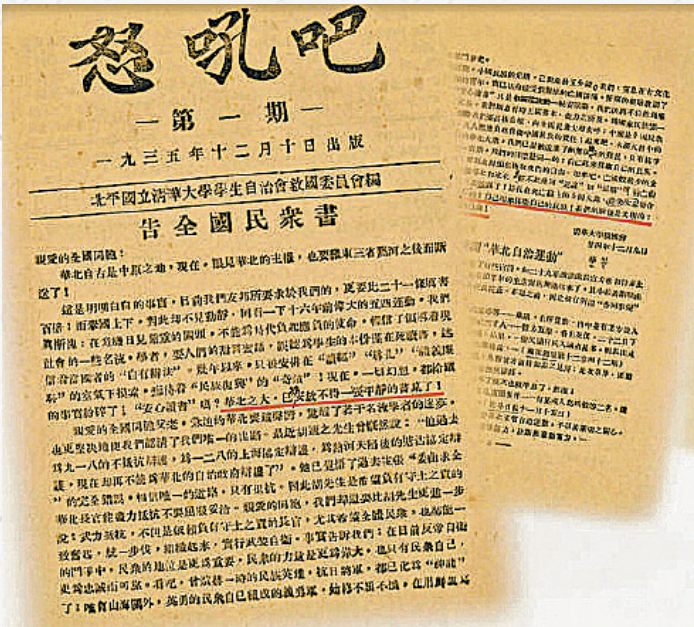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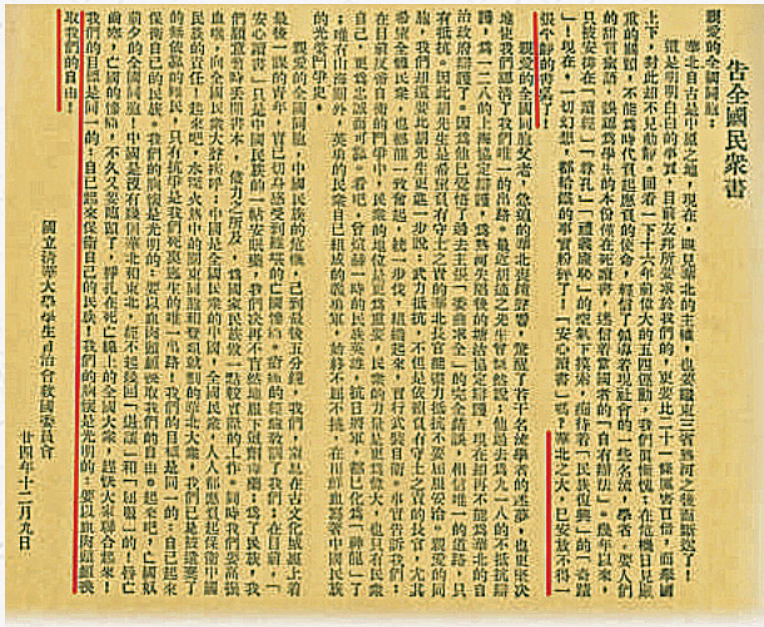


凭窗读史



《清华周刊》“一二·九”特刊《怒吼吧》(1935年12月10日)头版刊载的《告全国民众书》。



“一二·九”运动当天散发的《告全国民众书》传单版。

“一二·九”运动的心声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大学刊物《怒吼吧》(第一期)头版头条，刊出一篇题为《告全国民众书》、落款为“清华大学救国会”的战斗宣言，短短千余字，疾呼同学、同胞们起来保卫民族。尤其是文中这句慷慨激昂的呐喊，是学子们共同的心声，像一声轰响的霹雳，激起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这份珍贵的刊物，长期珍藏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

谁是《告全国民众书》的作者

执笔这篇宣言的是清华大学国文系四年级学生蒋南翔，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据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刊于1985年11月21日《新清华》)，《告全国民众书》是他在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写的，从1935年12月3日起笔，接连写了两个晚上，“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宣”。

在这篇宣告诞生之前，华北已深陷告急的态势。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并不满足，继续加紧向中原的侵袭。1935年夏，日本接连胁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积极策划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驱逐中国军政，扶植汉奸成立傀儡政权，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在此危急时刻之下，华北地下党广泛组织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斗争。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北平高校学生们也在迫切行动。清华大学校园中，在左派同学的组织下，暑假留校的同学成立了暑期同学会，蒋南翔任主席，推动同学们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秘密组织大家学习和张贴宣传《八一宣言》。这期间，此前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清华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被释放回校，恢复了处于瘫痪状态的清华地下党组织。不久后，何凤元被调往北平市工作，由蒋南翔接替担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

蒋南翔是江苏宜兴人，出生于1913年，1932年考入清华国文系，在同乡好友何凤元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进步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局势紧张，清华学生的抗日爱国思潮逐日上升，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和压制。1935年初，反动派接连到清华园抓捕进步学生，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动荡之中，蒋南翔临危不惧，坚持带领同学们学习斗争。他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通过撰写一系列文章继续宣传抗日。

1935年11月，在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成立了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总部就设在远离城区的清华园。学联决定近期发动北平学生游行请愿，由清华和燕京两校率先响应。清华虽有正式的学生会，却无意出面领导此事，蒋南翔等遂另外成立了清华学生救国会，共11人。11月27日，救国会向全校学生大会发出了游行请愿的提议，但在右派学生阻挠下，未能成功。蒋南翔等人并不气馁，分头找同学们走访、座谈，在一周后的12月3日再次提出方案，经过激烈辩论，全校学生大会终于通过了12月9日游行请愿的决议。

听闻这一消息，何凤元当日专程赶回清华园找到蒋南翔，建议他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正是这个提议，催生了激动人心的《告全国民众书》。

《告全国民众书》的另一个版本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汗来换取我们的自由！”几十年后，透过发黄的纸页，透过刊头“怒吼吧”三个道劲有力、直逼眼帘的行楷大字，依然能感受到这篇《告全国民众书》的激情，其字里行间发出北平青年学生“天下兴亡，书生有责”的强音。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清华学生团体团结广大同学，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为1934年至1935年清华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合影，左一为蒋南翔。

只是，《告全国民众书》作为吹响“一二·九”号角的对外宣言，为何游行次日，即1935年12月10日才发表在《怒吼吧》刊物上面？长久以来，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的研究人员有这样的疑问。

2015年，“一二·九”运动八十周年之际，细心的研究人员在资料调研中发现，蒋南翔本人曾在1985年的回忆中提到，“文章脱稿后，先在十二月六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又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十二月六日”在《怒吼吧》发表，显然是蒋老记忆有误，但他话语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一二·九”当天，《告全国民众书》应该还有一个用于散发、张贴的单页版。从逻辑上，这也才应当符合这篇宣告的来龙去脉和社会功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认真查找，研究人员在一本198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画册《一二·九运动》中，终于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图片。与《怒吼版》不同的是，这篇《告全国民众书》是竖排字，印在一张单页上。沿着这个线索继续搜寻，惊喜地发现，在2005年8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北京日报》曾采访研究清华校史的孙敦恒老师，孙老师提到，他曾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见过这张油印传单。清华档案馆遂联系国博询问，国博很快答复，他们藏品中的确有这张单页版《告全国民众书》！

在清华大学的申请下，2015年“一二·九”运动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单页版《告全国民众书》的复制件由国博交接至清华档案馆。同一文献，两个分体，终于在八十年前它诞生的清华园中合体了。

“一二·九”的火种

比较两个版本的《告全国民众书》，除了一横排一竖排之外，单页版落款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刊物版落款为“清华大学救国会”，此外还有文句上的一些细微差别。看得出，后者在文法和标点上稍更准确一些。

就像当时流行的《毕业歌》所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国耻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直上！”《告全国民众书》的主

要内容，也是向同学们以至全体国民讲明为什么“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为什么要打破“安心读书”的幻想，走出课堂，与全国同胞一起奋起反抗。全文充满了号召力与感染力，蒋南翔写道：“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创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再不敢贸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他大声疾呼：“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

透过这两份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的宣言文本，我们仿佛回到清华园里那个奋笔疾书的夜晚，清晰看到事件的全貌。

游行前夕，蒋南翔怀着激昂的心情写好这篇宣言后，随即以单页形式印发，慷慨陈词深得莘莘爱国学子共鸣。“一二·九”当天清晨，清华学生在北大操场集合，准备向城里进发，与其他高校学生汇合。同学们一路喊着口号、散着传单抵达西直门，不料，城门被早有准备的军警紧闭，不得入内。大家当下决断，一部分人在西直门城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散发《告全国民众书》进行宣讲，另一部分人则绕行其他城门。发现所有城门都无法进入，同学们激愤不已，商议要举行更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尽管被当局阻挠，学生们毫不畏惧，迸发出更坚决强烈的反抗。第二天，12月10日，稍经调整后的《告全国民众书》，就刊发在《怒吼吧》上面。《怒吼吧》是蒋南翔主编的《清华周刊》特为“一二·九”运动临时创办的特刊，这是第一期，也仅出此一期。这是学生们意志与激情的集中爆发。就在当天，北平学联决定举行总罢课。一周后，12月16日，在北平党组织的安排下，北平学生再度举行示威。临行前，何凤元也再度找到蒋南翔，请他起草了《一二·一六北平大中学校学生示威宣言》。经过吸取教训、周密筹备，这一次，他们冲开了城门，成功向北平市民播撒了火种。

继承前辈的“五四”精神，北平青年学生们再度将民族救亡重任扛起在肩，成为呼吁反抗日本侵略的先锋力量。“一二·九”的精神火种，久久流传，至今仍激励一代代大学生前行。

张玉瑶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今时今日，恐怕没人会不熟悉《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但在《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1935年，电影并不是一种能为大众所普遍享受的文化艺术。作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传唱到街头巷尾，在大江南北传开，成为鼓舞民族信心的最强音？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青年时代致力于国歌传唱、后来曾出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刘良模的长孙、和祖父共同生活过25年的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新，一段时代青年歌咏救亡的故事，浮出历史的水面。

做好战斗准备

1934年冬，刘良模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办起上海第一个民众歌咏会，不收任何学费，但需要学会后教别人唱。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发起者，刘良模并非音乐专业出身。“他和我讲的时候，我都有疑问，你一个学社会学的，怎么唱歌去了？”刘新说，祖父告诉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如今完全不同。他们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将来必有一战。那么眼前的迫切需要，就是要将群众动员起来。

“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就要去做。”刘新说。本身任职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有教群众唱诗的基础。他想到，可以用类似的事情，将大众团结、动员起来。

刘良模教群众唱的第一首歌，是他自己用美国民歌曲调编的《救中国》，歌词只有很简单的几句：“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

刘良模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到半小时，群众就学会了这首歌。最开始，大家的声音很细小，但很快洪亮起来。

“不能小看唱歌，卖报的也好，人力车夫也好，洗衣工人之类的也好，他们可能不识字，但都能学会唱歌，这样三教九流间，就能把革命的热情传递出去。”刘新说。

歌咏会发展得很快。组建之初，90多人几乎都来自青年会周边人士，但很快，歌咏会就吸纳了300多人。“一个多月后，青年会就在八仙桥，也就是今天的大世界那儿，办了第二个民众歌咏会。”刘新介绍，“两个会加起来，有近千人的规模。”

“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干的，而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刘新说。

随着歌咏会影响的扩大和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为便于通知和开展活动，歌咏会按照会员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分成活动小组。刘良模为各个小组选拔了练习歌唱的指导人员和负责联络工作的干事，建立起会属“民众歌咏干部训练班”，还请来洗星海等知名音乐人做指导。由此，一个正循环形成了：青年会歌咏队骨干被迅速培养成才，这些骨干又作为抗战歌咏的有生力量深入学校、里弄和工厂，向民众教唱抗战歌曲，组织歌咏会。

在这样的推动下，上海青年歌咏活动很快蔓延开来。不少仁人志士自发组织起歌咏队伍，以此唤起民众的救亡热情。

共振救亡强音

在刘良模组织出版的《青年歌集》序言里，他这样写道：“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组织民众。”

这就难怪，《义勇军进行曲》甫一诞生，就成为传唱的重头曲目。“我祖父一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就非常激动，他知道这首歌一定能传开。”刘新说。理由其实非常直接朴素，因为《义勇军进行曲》够短、够容易学，也够鼓舞人心。

很快，如刘良模所料，《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传开，甚至成为集会时几乎必唱的曲目。1936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和歌咏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作为执委的刘良模都会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

同年6月14日，刘良模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组织了一场约有五千人的抗日歌咏大会。

刘新说：“当时，为了阻挠这次歌咏活动，体育场举办了一场足球赛。但我祖父和歌咏队，就趁着裁判吹哨休息的时间，一哄而上，占据最高处，开始唱起来。”

当《义勇军进行曲》唱响时，全副武装的军警也停下了驱赶，加入了歌咏的队伍中。

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被当时的媒体记录下来，《申报》报道称：“每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场屏息，声振屋瓦。”

这次大会的集会现场照片，如今陈列在上海的国歌展示馆内。1937年8月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成立后，刘良模成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的负责人，提出要在最短时间里让全国人民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为了教唱抗日歌曲，他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

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和其晚年出版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都提到1937年他在中国看到刘良模教唱时的场景，“刘良模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了。年轻、身材修长、容颜俊秀的他，似乎一边倾听着每个人单独地唱，并及时纠正，一边自己也不停地唱着。他仿佛有分身术：既是唱歌者，像他的听众一样，唱出每个中国人的‘最后的吼声’；又是教导有方的教唱者和听者……”

群众学唱的场景，也深深感染了爱泼斯坦。“里面大约有400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学生、小文员、工匠、中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拉黄包车的……他们表情严肃，学一句重复一句；然后，一起唱两句，接着唱整段。每一唱句都是一个口号，展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释放出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林子璐 肖雅文



刘良模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一段时代青年歌咏救亡的故事，浮出历史的水面

歌声唤醒民众，唱出『最后的吼声』